

《源氏物语》

Yuan Shi Wu Yu Yu Zhong Guo Chuan Tong Wen Hua

与中国传统文化

姚继中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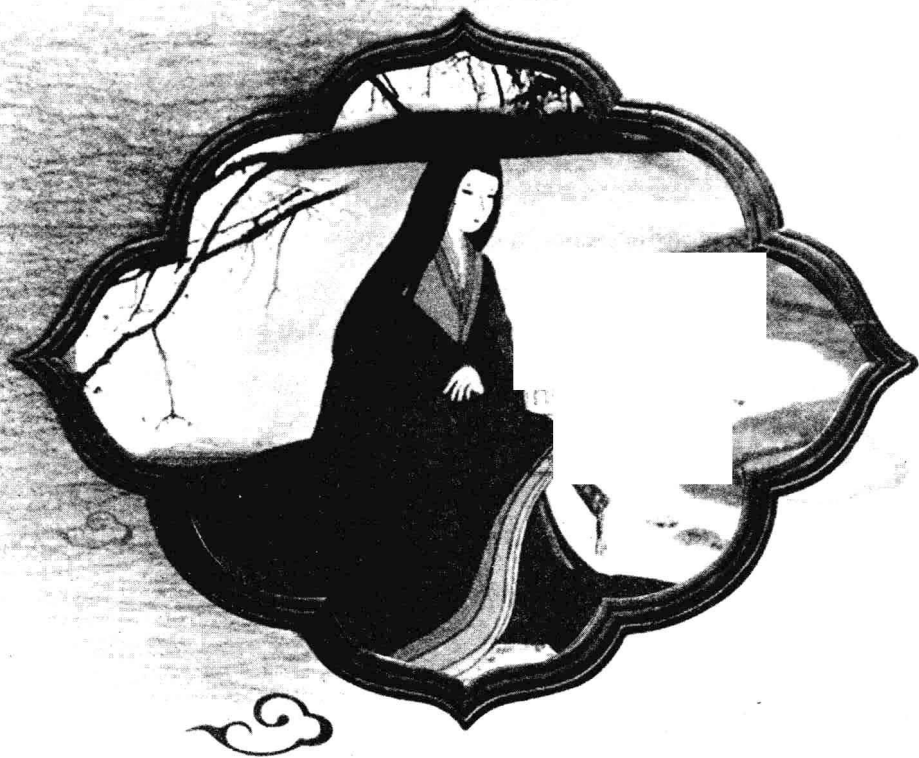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源氏物语》

Yuan Shi Wu Yu Yu Zhong Guo Chuan Tong Wen Hua

与中国传统文化

姚继中 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源氏物语》与中国传统文化/姚继中编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12
ISBN 978-7-80211-070-0

I. 源… II. 姚… III. 长篇小说—文学研究—日本—中世纪
IV. I313.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0624 号

《源氏物语》与中国传统文化

出版人 和 龔

作者 姚继中

责任编辑 王丽芳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话 (010) 66509360 (总编室) (010) 66509246 (编辑室)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址 www.cctpbook.com

印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本 787mm×1000mm 1/16

字数 160 千字

印张 15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5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66509618

前 言

《源氏物语》是世界文字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它比中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等大约早问世 300 年。但它的问世绝不是孤立的，它虽然根植于日本文学的沃土，但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源氏物语》研究在日本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源学犹如中国的红学，对《源氏物语》的研究即便是现在，日本每年大约要出 200 至 300 篇论文。然而，《源氏物语》对中国人来说虽不陌生，但对它的研究却十分肤浅，甚至误解，臆测甚多。

与西方文学名著相比，《源氏物语》作为世界文学名著之一，且又出自与中国有着深厚文化渊源的日本，中国的读者、研究者理应对其有着深刻的认识与研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从传播的角度还是从研究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对《源氏物语》的认识与研究远不如对西方文学名著来得深刻。

本书不同于日本学者对《源氏物语》的研究，即偏重于文献学研究，重点在于以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对《源氏物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挖掘与探讨。意义之一，是让中国读者能够正确地认识这部世界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意义之二，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提供准确、详实的资料，开拓研究的视野。

本书以专论的形式，从十个方面对《源氏物语》与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些粗浅的研究。第一篇——关于源氏物语，主要以论述与资料综述并重的形式，尽可能准确、详实地介绍日本源学界在《源氏物语》研究方面已形

成的共识。这些共识，将会令国内的《源氏物语》研究者们，重新审视自己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第二篇——源氏物语主题思想论，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即运用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论，把作品分为虚象、幻象和抽象三个层次，分别探索了《源氏物语》的表层、中介层和深层意义。第三篇——源氏物语悲剧意识论，以《源氏物语》的首卷《桐壶》为切入点，研究了它的悲剧意识导向决定了《源氏物语》的悲剧性质。第四篇——源氏物语和歌艺术风格论，论述了即便在日本源学界也鲜有人提出的《源氏物语》研究领域，这就是把《源氏物语》中的原创和歌，作为一个系统，去研究紫式部原创和歌的艺术风格。第五篇——源氏物语与唐代变文、传奇之比较研究，着重从文本形式与叙事范式方面，对《源氏物语》与中国唐代的变文、传奇进行了比较研究。第六篇——论紫式部对白居易文学思想的受容。关于白居易对紫式部的影响，国内出版过两本译著：《〈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丸山清子著、申非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白乐天与〈源氏物语〉》（中西进著，马兴国、孙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但本论另辟蹊径，通过民族与民族间对外来文化的融合范式研究，探讨了紫式部是如何接受白居易的文学思想、如何将白居易的文学观、审美观融入了《源氏物语》。第七篇——光源氏人物性格之哲学思辨。在国内的《源氏物语》研究中，对光源氏的评价大都是偏于负面的，这与中华民族的审美观、价值观，以及当今人们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不无关系。然而，光源氏的人物性格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复合体，不是可以简单地、轻易地得出好或坏的结论。本论从哲学的角度，对光源氏的人物性格进行了综合分析，以求《源氏物语》的读者能够更好地认识光源氏。第八篇——古典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融。《源氏物语》由丰子恺先生首次完整地译介到中国时（1980年～1983年），叶渭渠先生就在译序中阐明了《源氏物语》的基本性质：“《源氏物语》是日本一幅以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历史画卷。”“《源氏物语》正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通过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描写了当时贵族社会的腐败政治和淫逸生活。作者以典型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和特征，揭

露贵族统治阶级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揭示了日本贵族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叶渭渠先生的这个序言，认定了《源氏物语》是一部真实反映了日本平安时代的历史事实的现实主义小说。《源氏物语》无疑具有现实主义小说的一面，但同时又是一部古典浪漫主义的杰作。它的写实建立在虚构性上；它的叙事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特质。第九篇——源氏物语人物素描。本篇以素描的手法，对光源氏钟爱的女性进行了人物素描，使广大《源氏物语》读者，能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把握住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第十篇——源氏物语研究在中国，主要从研究状况与方法论的角度做了一些思考。

本书中的附录，是一个有关源氏物语研究的资料库，具体内容有：《源氏物语》研究史略表；《源氏物语》主要文学·文艺学事项；《源氏物语》主要礼仪·习俗·年中行事；《源氏物语》年表。

《源氏物语》研究在日本是一门显学，同时也是一般学者不轻易去碰的学问。它需要有古代语言学、古代文学、美学、佛学、汉学等深厚的修养作为研究的基础。同样，《源氏物语》在中国的研究，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研究深度与研究成果始终不尽人意。笔者自1996年开始接触《源氏物语》，至今已有8年的时间，从未敢动写一本有关源氏物语研究的专著的念头。我始终觉得，那不是我的能力与学识所能及的事情。正因为如此，这本《〈源氏物语〉与中国传统文化》，才以专题论述的形式构成了一本书。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它是点滴研究的积累。

总之，我希望这本小书能为中国的《源氏物语》研究提供些许新的资料和研究思路，同时也为我今后的研究奠定新的基础。

姚继中

目 录

前言	1
关于《源氏物语》	1
《源氏物语》主题思想论	64
《源氏物语》悲剧意识论	75
《源氏物语》和歌艺术风格论	85
《源氏物语》与唐代变文、传奇之比较研究	96
论紫式部对白居易文学思想的受容	105
光源氏人物性格之哲学思辨	117
古典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融	130
《源氏物语》人物素描——光源氏钟爱的女性	143
《源氏物语》研究在中国	148
附录	
《源氏物语》研究史略表	162
《源氏物语》主要文学·文艺学事项	181
《源氏物语》主要礼仪·习俗·年中行事	216
《源氏物语》人物年表	224

关于《源氏物语》

提到日本文学，恐怕没有比《源氏物语》更伟大的作品。《源氏物语》不仅在日本文学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在世界文学史上，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日本，关于《源氏物语》的研究，与中国的“红学”研究十分相似，不仅研究的历史长，而且研究得非常深刻。然而，《源氏物语》不同于《红楼梦》，由于它的成书已有千年的历史，加上受当时社会发达程度的局限，因此，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源氏物语》是否就是当初的形态？《源氏物语》是否是紫式部一人所作，是否是一次成书？以及它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平安时代的某一段宫廷史实等等，都还没有准确定论。所以，《源氏物语》的研究并不因其历史悠久而走向终结，相反，随着新的考证、新的发现，其研究工作也将不断向纵深发展。

《源氏物语》的核心是以“雅”为最高审美境界的“美”，倘若把这部巨著称之为日本传统美学的百科全书，我认为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川端康成在《日本的美与我》一文中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平安朝文化“形成日本的美，产生了日本古典文学中最上乘的作品，诗歌方面有最早的敕选和歌集《古今集》，小说方面有《伊势物语》、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等，这些作品构成了日本的美学传统，影响乃至支配了后来 800 年间的日本文学。

有人认为，《源氏物语》是一部写实小说，它如实地记载了平安时期的某段历史与真实的人物、事件，旨在反映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也有人认为它就是一部恋爱小说，详细地记述了以源氏为中心的三代人的恋爱史；更有人认为它是一部警世之作，目的是教化百姓，劝善惩恶。诸多观点，不一而足。

足。《源氏物语》果真是一部如此单纯的作品吗？回答无疑是否定的。《源氏物语》的复杂性与中国的《红楼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相上下。正因为如此，几百年来的源学研究，虽说是硕果累累，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开辟了诸多领域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但得到的研究成果并不能令我们满足，未知的问题仍然很多，有待于我们今后长期不懈地努力。

本篇以“关于《源氏物语》”为题，借助手头上搜集到的资料（主要以日本小学馆1981年出版的日本古典文学全集——《源氏物语》卷，以及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简约版》等数十种资料为资料来源），在分析研究的同时，旨在把日本“源学”界基本公认的、相对客观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的《源氏物语》研究界与比较文学研究界，力求做到资源共享，以冀摒弃《源氏物语》研究中太多的主观臆测。

一、关于紫式部

1. 紫式部生卒年

“紫式部”并非是《源氏物语》作者的真实姓名。目前能够确认的是，作者姓藤原，但名字不详。作者的兄长时任式部丞，按当时宫中习惯，宫中女官往往以父兄官衔为名，以示其身份，故称为藤式部。后来她写成《源氏物语》，书中女主人公紫姬为世人传诵，人们便称该书作者为“紫式部”。紫式部的生卒年不详。关于其生年，著名源学家今井源卫认为是天禄元年（970年），而安藤为章、冈一男则认为是天延元年（973年），与谢野晶子认定为天元元年（978年）。无论是今井源卫、安藤为章、冈一男，还是与谢野晶子，他们都没有确切的考证结果，而是经过推论形成的自己的看法。

至于卒年，一时曾有过万寿二、三年（1025年—1026年）之说，但后来由于与《荣花物语》中的记述不符，此种说法遂被否定。其后，冈一

男发表了详细考证——《源氏物语》基础性研究，提出紫式部的去世是在长和三年（1014 年）二月。冈一男这一说法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依照冈一男学说来推算的话，紫式部去世时应为四十二岁，此时其女贤子应为十六岁。由此看来，陶力女士在其《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年版）中认为“紫式部生于公元 937 年（一说为 978 年），大约卒于 1014 年”是有误的。陶力女士的“公元 937 年”的根据出自于何处，我们不得而知。问题是紫式部倘若真是生于公元 937 年，那么紫式部去世时的年龄就应该是 77 岁，而且她与藤原宣孝的成婚，便是 60 岁左右，这绝对是有问题的。

2. 紫式部的未婚时代

如果紫式部是生于天延元年（973 年）的话，那么其父藤原为当时大概是一个文章生。有关紫式部少女时代的资质，我们从《紫式部日记》的记载，便可见一斑。根据记载，父亲在教授惟规汉籍时，紫式部也在一旁聆听，并且能够比哥哥更快地掌握父亲教授的内容。父亲因而惋叹：“如果此女是个男子就好了！”由此可见，紫式部从小就十分聪明伶俐。而她在后来的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丰富的知识和横溢的才华，多半也都是得益于少女时代对汉籍的研习。当然，在日本的平安时代，作为中层贵族家的女儿，也应该具备这样的修养。但紫式部并不仅仅是具备了这些基本的修养，而是应该用出类拔萃来评价。我们不妨看一下紫式部的和歌与书法造诣。在和歌方面，紫式部虽然不能说是出类拔萃，但也算是一流的歌人。尤其是《源氏物语》中独白式的和歌，别有一种独特的深沉韵味，这也许是来源于她精神积淀的厚重性吧。至于书法方面，由于尚未发现紫式部的遗作，所以我们对此不得而知。不过，既然她能赋予《源氏物语》中的人物以敏感锐利的鉴赏眼光，想来她自己也应该是精通书法的。另外，紫式部在绘画和音乐方面似乎也颇有造诣，其中最拿手的便是箏（十三弦），这一切都能从《源氏物语》中找到佐证。至于文章方面，既然她能写出《源氏物语》这样的传世巨作，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称她为一代文学巨匠呢。

当然，她的每一篇作品是否都是如此行文流畅，对此学术界尚有一些疑问。例如《紫式部日记》中的文章，虽然在遣词造句上可以说是十分达意，但在行文明快方面，却有所欠缺。或许在紫式部看来，日记只是帮助自己记事，读者是记日记者本人，不需要过于认真吧。总体说来，紫式部在写作方面，是一个偏重于推敲字句、讲究引经据典的人。

日本平安时代是一个极端崇尚中国唐文化的时代，特别是宫廷贵族，无不以通晓汉文典籍为荣。与此同时，女性却于汉文典籍无缘。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不应该识汉字、读汉文，否则就会变得不幸。所以在那个时代，懂得汉诗文的女性可以说是具有某种特殊的修养。并且，这样的女性似乎还为数不少。根据记载，虽然曾经有不少好心人劝告紫式部不要再读汉文典籍，但处在父亲精通汉文典籍这样一个诗人之家的氛围之中，其父却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对她研读汉文典籍，特别是《白氏文集》。在开始创作物语之后，或是写日记之时，作为女性，紫式部有时也会故意以男子的气度，卖弄一些批评性的言辞，从而使得文字的内容以及构架，显现出相当强韧的思考力度。对于这种具有天赋性的思想深度，人们普遍认为，是通过大量阅读汉籍而磨炼出来的。可以想象，这种对汉文典籍的研习，不仅对紫式部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还对其婚前的踌躇以及比常人更深刻地去思索自身、思考人活着的意义等方面的问题，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说，正是紫式部的学识造诣和涵养，造成了她不同于一般女性的内敛性格。

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女性的社交范围十分有限，能够结交到的朋友无非是亲戚或家里的熟人，所以，一般来说女性的朋友都为数不多。紫式部也不例外，能称得上朋友的，似乎也只有寥寥几位。在紫式部所著的个人歌集的开头，就有一首写于童年朋友相隔数后来访，未能从容叙话便返回之时的和歌：“一别数年今邂逅，是否故人尚未明，已如夜月杳云中”（此歌被收入《百人一首》）。随后，她又以“闻故人远行，暮秋指晓，虫声幽幽”为题，作了如下这首和歌：“虫声幽幽，留不住暮秋渐逝，离别

更添新愁。

之后，其姐亡故。紫式部由此对一个死了妹妹的朋友说道：“让我们彼此代替亡故之人，作对方的姐妹吧。”因而在此后的信中，她们开始互以姐妹相称。据说以“各奔东西难聚首，昔日一别今犹惜”为序的和歌“鸿雁北去，一借羽翼化素笺，难尽别后思念情”，便是紫式部为这位朋友而作的。从这首和歌的遣词造句来看，应该是作于长德二年（996年）（紫式部当时约为24岁），即陪伴父亲前往越前国上任之时。

关于紫式部少女时代的生活，现在尚未找到明确的佐证资料。但是，在被认为是作于这段时期的和歌中，有好几首似乎是与同去西国的朋友之间的赠答歌。尽管对当时的旅途稍作想象，就能体会歌中的那种悲伤情绪，但相比于赠歌，紫式部的答歌却并不似对方那么阴郁。作为一位当时的女性，紫式部无疑是个性格冷静的人。虽然在陪伴父亲前往越前国的途中，作者曾咏叹“京城令人眷”，可从她的和歌中并没有看到太多离开京城的怨言。

随父亲前往越前的旅行，在当时来说，应该是紫式部一生中的大旅行，也是结婚前的一大体验，长德二年，紫式部乘船过琵琶湖，在琵琶湖的北端盐津上岸，接着翻山越岭来到敦贺，然后再次长途跋涉，好不容易才到达靠近越前平原南端的国府（福井县武生市）。紫式部虽然未曾在日记中把自己经过的地名与艰辛罗列出来，但从她缺少连贯性的和歌中，仍可以看到她对旅途中的奇异风情惊讶不已。眼前的纤夫，翻山越岭的老百姓，京城无法感受到的普通人群的生活状态，令紫式部颇有感触。然而，究其身份，紫式部也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已。

越前的冬天十分严寒，入冬后不久，便积雪甚深。虽然越前之行对紫式部后来的创作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她对实实在在的越前生活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兴致。紫式部毕竟属于中等贵族阶层，我们不能期待她舍弃平安京的繁华，对平淡的地方生活重新审视。这两种生活的落差是如此之大，即便不从贵族与平民百姓这一阶级差异去考虑，仅对一个长期生活在平安京这块日本与中国唐文化临界点上的知识女性来说，根本没有

消除这种落差的余地。虽然紫式部也曾认为照顾已经步入老境、且又没有妻子相伴的父亲，是 24 岁的女儿责无旁贷的义务之一，但最后还是未能善始善终，先于父亲一步离开越前。于是，紫式部再次乘船穿过琵琶湖，于长德三年或四年的秋天匆匆返回京城。据说，紫式部之所以匆匆返京，与她 and 藤原宣孝的婚事不无关系。

3. 紫式部的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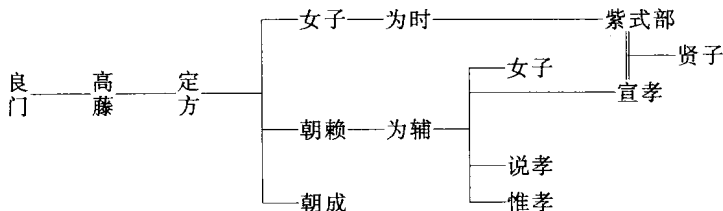
与藤原宣孝的婚事是否就是紫式部的第一次婚姻，现在暂且不详。不过可以大致肯定的是，这桩婚姻是在作者从越前返回京城后不久的事。假设当时是长德四年的话，那么作者的年龄估计是 26 岁。当时的女性 12、13 岁行“着裳礼”后，就被当作成人来对待，14、15 岁结婚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由此来看，作者是相当晚婚的了。另外，藤原宣孝当时的年龄也不甚详，据史料推算年龄，应该在 45 岁左右。如此说来，在这桩婚姻中，男女之间的年龄差距，有若父女般的巨大悬殊。

虽然紫式部的父亲藤原为时在家赋闲的时期很长，但其好歹也算是中层贵族出身，拥有高贵的名门血统。所以，即使紫式部在容貌方面算不上绝代佳人，但在能力上应该是不输给一般女性的。既然如此，为何紫式部直到 26 岁才结婚，并且结婚的对象还是一个和自己年龄差距如此之大的藤原宣孝？这些事情实在令人感到费解。因此人们推断，与藤原宣孝的婚事，说不定并非是紫式部的第一次婚姻。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紫式部之所以如此晚婚，是因为其在 20 岁前后的这段时期里，有过某种不幸的恋爱经历。虽然这种说法现在还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但如果将紫式部在个人歌集、日记和物语中表现出的心理状态，以及至此为止的各种经历结合起来，再把她置于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女性的位置上考虑的话，不是不可以作出某些合乎常规的推测。另外，那些关于结婚年龄和结婚对象的疑问姑且不说，稍稍理性地分析一下她在丈夫死后所作的和歌和日记述怀中表现出的那种绝望的灰暗心情，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我们所知道的紫式部的现实生活背后，或许真

是有段不幸的恋爱经历乃至一段不幸的婚姻。

再说藤原宣孝。稍经查证便可发现，其人原与紫式部是同祖。（见图）



藤原宣孝之父藤原为辅官拜权中纳言，于宽和二年（986年）去世。祖父藤原朝赖曾居左大弁的要职，其兄藤原朝成任中纳。藤原朝赖的父亲藤原定方当时任右大臣，与兼辅（紫式部的曾祖父）关系密切。藤原定方之父藤原高藤亦为朝中重臣，曾担任内大臣的职务。与紫式部家族的历代成员相比较，藤原宣孝家族中曾汇聚了不少能干的朝廷官员。遗憾的是，家族的辉煌没有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到藤原宣孝的兄弟一代，就只剩下地方官了。往上追溯，紫式部的祖母与藤原宣孝的祖父是兄妹。而藤原宣孝与藤原为时既是亲戚，又是在同一年成为藏人（官衔），因此，他们当时的交往应该是很密切的。

藤原宣孝曾先后历任备后、国防、筑前、山城国守，后又作为京官任职卫门府，最终官拜右卫门权佐兼山城守正五位上。（“位”是日本朝廷爵位高低的标志，从一位到最低位八位，共三十级，各有正从之分，四位以下又有上、下之分。）

结婚之后争吵时有发生。由于为藤原宣孝已经生儿育女的女性至少有三，所以藤原宣孝也就不可能只对紫式部一人呵护备至。因此，夫妻间似乎也曾就此事有过一些争执。不久，大约在长保元年（999年）或是长保二年，紫式部生下一女，取名贤子，即后来的大式三位。

其时，藤原宣孝官任右卫门权佐兼山城守（长德四年），同时还作为奉币使（在神前献币帛）往返于丰前国宇佐神宫与平安京之间。三年一度的奉币使，其职责是向神灵禀告自长德四年夏天以来，疫病流行，大风侵

袭，皇宫被焚，太宰府里有夷狄来袭之忧等等事宜。为期三个月左右的旅行平安结束后，藤原宣孝又作为平野社临时祭典的敕使，负责相扑节会的召集，以及侍奉殿上的音乐等相关事宜。但是在担任敕使之后不久，即长保三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枕草勘物》说为七月）藤原宣孝便去世了。

疫病在这一年并未减退。“自去年冬天开始至今年七月，天下疫病流行，死者甚多。道路死骸不计其数。更勿说已敛葬之辈，乃有成千上万之众。”（《日本纪略》长保三年末）。相关记载不但见于《日本记略》，其他的一些史料里也有疫病蔓延、其状惨不忍睹，以至于朝廷上下频繁举行《金刚寿命经》、《大般若经》的诵经会、及祭祀瘟神的御灵会的相关记载。由此看来，藤原宣孝的死因或许与瘟疫流行不无关系吧。

然而，不论藤原宣孝有过几位妻室，也不管婚姻是多么的短暂，紫式部都不得不去背负这种死别所带来的悲凉与哀伤。在此之前，对于这桩可以说是相当晚婚的婚姻，紫式部似乎有过长时间的踌躇。也正因为如此，将一生的幸福都押在了这桩婚姻上的心情就更为强烈。可事与愿违，这一切都随着藤原宣孝的去世而残酷地坍塌了。对于紫式部来说，这似乎是她一生中所受到的最为沉重的打击。

“万念俱灰心已死，枉留躯壳空无物。”

“心灰意冷魂出窍，焉知躯体何处依？”

这两首和歌如实地记下了紫式部当时的心情。紫式部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自己如今为何陷入了出乎意料的不幸之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在紫式部心中，这种几近绝望的情绪渐渐地高涨起来，这在上述两首和歌中一表无遗。所谓的“心”指的是紫式部自己的精神活动与思考；而“躯”则是自己现实的境遇，以及随境遇而不断改变的感情。突发的不幸，使紫式部的“心”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更无法进行理性思考。虽然人生中有过许许多多的坎坷，但自己从未想过竟会落到这般境地。紫式部的处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平静的“心”怎能不随之动摇，产生不平、不满或感慨

呢？“心”是属于自己的，原本希望它能够随遇而安，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遇，都希望它能平静地跳动。但现在一切都变了，变得连自己是谁都无法清楚回答了。对紫式部来说，作为一位处于社会生活弱势一侧的女性，根本不可对眼前发生的巨大不幸无动于衷！

不幸毕竟降临在紫式部的头上。紫式部不得不认命，不得不直面现实。尽管紫式部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并认定所谓的“心”就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力量，但等到她再次重新审视的时候，又觉得自己仍然什么也说不清楚。平心而论，紫式部在不幸面前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失败者，她把自身的不幸作为思考人生的切入点，并能够将思想的触角深入到观察、分析整个人性心理，并且得出一定的结论，即：人生观和世界观并非一成不变。

在和幼小的女儿相依为命的未来岁月里，我们能从紫式部身上看到的，似乎只有那没有溢于言表的绝望之情。不过，此后不久，紫式部便开始思考这种由绝望而产生的“心”与“躯”之间的关系，并将自己的思路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在她的日记中，紫式部从自身所处的境遇出发，阐述了自己透彻思考后的结果。她认为，直面不幸与超越不幸与其说是自己的将来，不如说是作为人都将面临的未来。同时，她还将这些结论零零碎碎地写给了自己的朋友们，希求得到某种心灵上的共识。除此之外，紫式部在日记中还记述了自己在渴望慰藉的日日夜夜里，是如何借助物语以及和歌中所叙述、咏叹的人生观来排解自己的心结，并尝试着将其付诸文字的经历。

如果藤原宣孝活得更久一些的话，也许紫式部会因为身边的琐事而更加烦恼吧，抑或还会使她成为一个平平庸庸终其一生的人。然而这种平稳无惊的生活崩溃了，也正因为如此，紫式部才开始在高于生活的层次上展开自己的思考。所以，我们可以说，正是这种不幸的境遇造就了《源氏物语》的作者。虽然对《源氏物语》开始创作的时间问题仍旧众说纷纭，但人们普遍认定大致的范围，是紫式部从与丈夫死别到出仕宫廷这段时间中创作的。

4. 紫式部的宫廷生活

《源氏物语》的作者之所以被称为“紫式部”，与其出仕宫廷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于其出仕的时间，有宽弘二年（1005年）、宽弘三年、宽弘四年诸说，一般认为宽弘二年或宽弘三年较为妥当。如果是宽弘二年的话，那么可以初步推定紫式部当时的年龄约为23岁。

当时的女性并不一定乐意出仕宫廷，世人也并非都认为出仕宫廷是件好事。虽然以前也曾有女性因为出仕宫廷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幸运，但自从藤原道长执掌政权之后，这种梦想就不再有可能实现了。当然不排除有人继续抱有这种天真的幻想，但最终恐怕只会因此而遭到贵公子们的玩弄。作为当时的社会常识，女性禁止在男性面前露出自己的真实容貌。然而，紫式部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仕宫廷，其中肯定有她不得已的苦衷。其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紫式部的父为藤原为时曾受藤原道长之恩，由小国淡路守改任大国越前的国守，并且在归京之后，作为诗人而受到青睐。所以当藤原道长邀请紫式部出仕宫廷之时，紫式部自然不便拒绝。同时，这也是关系到父亲、兄弟的前途，尤其是自己女儿贤子的未来。紫式部此前的不幸遭遇，早令她觉得“此身何足惜”。在受制于种种客观因素制约、无法令自己超越于世俗之外的情况下，紫式部决定舍去重重顾虑，毅然出仕宫廷。然而事实证明，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在雍容华贵的中宫身边当侍女，紫式部体会到了与此前迥然不同的另一种痛苦与忧愁。

尽管紫式部是以这种并非出自自愿的原由和心情出仕宫廷的，但在进宫之后，却能尽心尽责恪尽职守，而且一直持续到她的晚年。紫式部处在后宫这样一个纯粹的女性世界之中，与其他侍女相比，她的修养无疑令她如同鹤立鸡群。正因为如此，紫式部似乎也曾被人认为傲慢、摆架子，受到过一时的孤立。但紫式部对此不予置理，始终沉默寡言，行事谨慎，从而受到藤原道长夫妻以及中宫的赏识，同时也结交到大纳言君、宰相君、小少将等几位亲密的朋友。这些朋友大都有过眼前的或往昔的不幸经历。